康、乾南巡与“康乾”盛世

——再论康乾南巡

王俊义

在有清一代的历史事件中，康熙与乾隆的南巡，可谓引人注目的话题。此事不仅在当时的官书文献、稗乘野史中多有记载，而且有关的遗闻佚事，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，甚至成为戏剧题材，经久不衰。究应如何正确评价康乾南巡？其在清代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作用和影响？无疑是清史学界责无旁贷应予回答的问题。

前几年我曾与黄爱平同志撰写了《康熙与乾隆南巡评议》(《文汇报》1983年8月15日)，《康熙与乾隆为何皆六下江南》(《文史知识》1985年第8期)。文中指出康熙与乾隆虽然都是清代有作为的封建帝王，各以其文治武功，开创和发展了史称的“康乾盛世”。但是，他们的个人建树、作风与影响又迥然有别。即以南巡而论，二者均以巡视河工、咨访吏治民情为由，历经二、三十年，皆六下江南，且均被时人交口称赞为“巍巍盛典”，二者的南巡似无二致。其实，由于康熙和乾隆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，面临的问题不同，二人的统治作风也不同。因而，他们南巡的目的、作用和影响，也很不一样。有鉴于此，我们在文章中也明确指出：康熙南巡确为治理黄河、考察民情吏治，即所谓“为百姓阅视河道、咨访闾阎风俗”；而乾隆的南巡则主要是游山玩水，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“江南名胜甲于天下”，正可借南巡“眺览山川之佳秀，民物之丰美”。文章发表后，曾经有些师友或撰文、或面谈，认为我们对乾隆南巡的评价似否定过多。还有些报刊对乾隆南巡展开讨论，在此过程中，有的论者撰写了《乾隆六下江南辨》，斩钉截铁地指出：“说乾隆六下江南骄奢淫逸，寻花问柳，每次出巡动辄万银千金，挥霍无度。这些与史实符合吗？否！”(《北京晚报》1984年4月14日)；也有论者认为“乾隆南巡不宜一概否定”。当然也有论者认为“乾隆南巡实为大过”。这表明学术界对康熙南巡的评价似无疑义，但对乾隆南巡的评价，则存在较大分歧。我认真拜读了上述有关文章，并与一些师友切磋讨论之后，深深感到对于康熙、乾隆南巡的评价，不能仅就表面的历史现象就事论事，倘若列举出乾隆南巡中做了某些好事，就为之辨解，否定其有“骄奢淫逸”、“挥霍无度”的一面，既缺乏说服力，也不能揭示历史事件的实质；反之，如只罗列乾隆南巡中“骄奢淫逸，挥霍无度”的史实，而不结合其所处时代历史的发展趋势，并分析乾隆对时代提出的问题所持的态度，便简单地对乾隆南巡作出否定性的评价，也很难把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。如综合考察康熙、乾隆南巡的全部过程，及其在当时和后世发生的作用和影响，便可看到康熙的南巡促进了康乾盛世的形成和发展；而乾隆的南巡，虽然也做了某些有益的事情，但就其主要方面看则是劳民伤财，成为康乾盛世由盛转衰的原因之一。联系到此次全国清史讨论会的主题——康乾盛世与康乾南巡，既然康乾南巡与康乾盛世的形成发展及由盛转衰有相互联系，就有必要把康乾南巡置于康乾盛世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，也许会将如何评价康乾南巡的讨论引向深入。

在清朝统治近三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，出现了康乾盛世，这是史学界一致公认的。康

乾盛世，历经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，但就盛世之为盛而论，并非囊括此三朝的起终。康熙初年，尚处于战乱未定、国困民穷的局势。南方有“三藩”割据，拥兵自重；西北有蒙古准噶尔部上层制造民族分裂，东南海上则有郑成功后代占据台湾；东北边境又有沙皇俄国不断觊觎侵扰，总之，政治上安定统一的局面，尚未形成。同时，当时的社会经济，也因多年战乱，呈现停滞萧条，急待恢复的状态。因此，康熙初政的一、二十年内，并未出现盛世的景象。但康熙不愧是杰出的封建帝王，他冲龄即位，很快便清除了专横复旧的鳌拜集团，恢复并发展了多尔衮、福临时期的政策，首先以极大的精力，进行统一，消灭抗清武装，平定三藩叛乱，统一台湾岛屿，击败沙俄侵略，又曾三次亲征噶尔丹。可以说，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，二十二年统一台湾，结束了明清之际开始的中国社会各阶级，以及满汉各族统治集团间力量的角逐过程，标志了清朝在中国的统治渐趋稳定，才为康乾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，此时可谓康乾盛世的起点。康熙在进行政治统一的同时，又励精图治，整顿吏治，改革赋税，奖励垦荒，治理河患，与民休息，采取种种措施，发展社会生产，使明末清初遭到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，得到恢复和发展，为康乾盛世的形成奠定了社会物质基础，并为盛世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。康熙实为康乾盛世的开创者和奠基人。但是，康熙晚年，由于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愈演愈烈，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不安定因素，加之康熙对官吏长期采取了宽松政策，至其晚年，吏治腐败也较为严重，这种情况如进一步发展，盛世的局面则难以巩固。雍正继康熙之后即位，他针对康熙晚年存在的问题，严刑峻法，整顿吏治，稳定政治局势，又采取一系列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，终于扭转了康熙晚年的不景气局面，使盛世一度出现的停滞状态再度走上发展之路。由此可见，雍正一朝，承上启下，是康乾盛世的中间环节与重要组成部分，雍正皇帝胤禛也不愧是一个有作为的封建君主。乾隆是在康熙、雍正两朝奠定了坚实的政治、经济基础上登基的，不可否认，乾隆皇帝弘历，在清王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史上，也是个杰出的封建帝王。他登上皇位后，雄心勃勃，颇欲有所作为，也确实有巨大的功业，特别是在加强与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，继康熙、雍正之后，进一步平定了各边疆地区民族上层分子的分裂叛乱，有效地在西藏、青海、新疆等地设立了行政管辖机构，进一步巩固和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。同时，在他统治期间，社会经济文化，也有进一步发展，使康乾盛世达到了鼎盛时期。但随着封建王朝的强盛，封建统治阶级的奢靡之风也急遽发展，乾隆皇帝本人更是如此。他作为鼎盛局面下的最高统治者，与艰难创业时期的君主所处的历史环境很不相同，就其本人的性格而言，又刚愎自用，好大喜功，常从形式上效法先祖，致使社会矛盾逐渐加剧，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，终于在乾隆三十九年，在逼近畿辅之地的山东爆发了王伦领导的武装起义。从此之后，形形色色的起义斗争，此伏彼起，如苏四十三起义、田五起义、林爽文起义、苗民起义等。这表明康乾盛世，从乾隆中叶后，逐渐转折，开始由盛转衰。正如清代杰出思想家龚自珍所指出的“承乾隆六十载太平之盛，人心惯于泰侈，风俗习于游荡，京师其尤甚者，自京师始，概乎四方，大抵富户变贫户，贫户变饿者，四民之首，奔走下贱，各省大局，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日月，奚假问年岁？”①康乾盛世的由盛转衰，是封建社会本身固有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，同时在由盛转衰的过程中，也和当时统治者的政策与作风有直接关联。我们说乾隆南巡造成的消极影响，是康乾盛世由盛转衰的重要契机之一，便着眼于统治者的作风及其影响。

从康乾盛世的形成发展直至鼎盛，并由盛转衰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出发，我们再来考察康乾南巡的具体情况，及其作用和影响，便自然会得出较为符合历史实际的公允评价。

康熙的六次南巡，首次始于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年），末次止于康熙四十六年（1707年）。其首次南巡，正是在平定三藩之乱，统一台湾之后，康熙曾经说："朕听政以来，以三藩及河务、漕运为三大事，夙夜廑念，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"。②从实际情况看，康熙南巡的目的，首先是为了治理黄河。明末清初，因战乱频仍，黄河多年失修，淤沙堵塞，常造成巨大灾害，自顺治朝起至康熙朝初，大的决口即达80余次。康熙深知"黄、淮两河关系运道民生，最为紧要"，因而把治河列为国家三大事之一，并经常阅读"前代有关河务之书"，与大臣共筹治河之策。二十三年，他第一次南巡，便亲临治河工地，视察河务，了解"河势之汹涌漶漫，堤岸之远近高下"。命令河臣加固运河堤岸，以抗御黄河水流的冲击侵蚀。三十八年，康熙第三次南巡，又"亲乘小舟，不避水险，各处周览"。经过实地调查，提出"治河上策，惟以深浚河身为要"，并指出要在疏通河身的同时，注意于两岸修筑堤坝，约束河水，使黄河顺流入海。经康熙多次实地考察指示策划，终使黄河的治理逐见成效，"黄水畅流入海，绝无倒灌清口之患"。此后，河道尽管时有溃决，但终康熙之世，水患基本上得到控制。这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，以及人民生活的安定，无疑大有裨益，显然也促进了盛世的形成。

咨访吏治民情，团结笼络江南汉族士大夫，是康熙南巡的另一重要目的。江南素为物产丰盈之地，号称人文荟萃之邦，其民情之安沸，吏治之好坏，人心之向背，不仅直接影响到清朝赋税的收入，更关系到统治政权的稳定与否。特别是南明的几个小王朝，曾先后在江浙一带建立，江南地区的抗清斗争也最为激烈。顺治时，对汉族士大夫的反抗，主要采取了高压政策。康熙鉴于形势的变化，改变了顺治时的高压政策，每次南巡都谒孔庙，拜禹陵，祭明太祖陵，以迎合汉民族心理。同时，为扩大江南汉族士大夫的入仕之途，还广增学额，对江南有名的文人学士，甚或亲自接见，以示恩宠。通过这些活动，使汉族士大夫，消除反抗意识，进而依附于清朝，以扩大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。在团结笼络汉族士大夫的同时，康熙于南巡时，也十分注意咨访吏治，考察民情。他曾说："臣下之贤否，朕处深宫，何由得知，缘朕不时巡行，凡经历之地，必咨询百姓，以是知之。"通过巡行中实地考察到吏治情况，决定官吏的升迁任免，有利于吏治整顿和政治清明。康熙在南巡中，也十分重视了解民情，注意为各地兴利除弊，如其第一次南巡时，看到高邮一带庐舍田屋仍被水淹，百姓皆"择高阜栖息"，极为同情和忧虑，便"登岸巡行数十里，召耆老详问致灾之故"，筹商救荒之策，而后令地方官吏"浚水通流，拯此一方民命"，使"百姓欢悦，不胜鼓舞感激"。⑤康熙的这些举措，自然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，心向朝廷，安居乐业。

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康熙作为一个封建帝王，在南巡时，能"躬行节俭"，"不讲排场"。他每次南巡，都"简约仪卫，卤簿不设，扈从者仅三百余人，一路上，不设营幄，不御屋庐"，一切供应，"皆令在京所司储偫"，不滥取之民间。他多次告诫臣工，南巡是"为百姓阅视河道，咨访闾阎风俗"，"非为游观也"，⑥因而严禁地方官吏布置供帐，科派扰民。如二十八年，康熙第二次南巡时，江宁地方官为其"装饰舟船以待"。康熙到后，不乘坐，不观看，反严令"将造饰物料俱行拆毁，于应用处用之"，并传谕当地官吏引以为戒。由于康熙"崇俭黜浮"，官吏不敢铺张，对所到之处百姓的惊扰也就比较小。对此，长期在清廷供职的法国传教士白晋曾予评论说："（康熙）力求节俭"，那种"亚洲君主们所到之处，都喜欢炫耀自己的豪华与奢侈"的情形，"在康熙皇帝周围是根本看不到的"。⑦

上述有关史料记载和评论，虽不无溢美之词，但毕竟反映了一些康熙南巡中的实际情况。

正由于康熙南巡中阅视河道，咨访吏治，考察民情，躬行节俭，因使当时人感到“天恩温谕，莫可殚述，江南父老至今犹能言之”。⑧康熙作为一个创业之主，他在南巡中的实践活动，对社会历史的发展，无疑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。他的南巡，可以说是康熙开创康乾盛世的具体历史实践。

乾隆是在康熙、雍正两朝奠定了坚实的政治、经济基础上登基的。经过顺、康、雍近百年的休养生息，清王朝已出现了政治统一、经济繁荣、统治稳固的局面，这种历史环境与康熙执政之初是很不同的。乾隆看到其祖父康熙六下江南，“盛典昭垂，衢谣在耳”，因于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起，中经二十二、二十七、三十、四十五，直至四十九年（1784），也前后六次南巡。乾隆本人对其南巡自视甚高，他说：“予临御五十年，凡举两大事，一曰西师，一曰南巡”。并强调“南巡之事，莫大于河工”，可见他在南巡中，也比较注意兴修水利，治理河患，特别是对浙江的海塘工程，给予了较多的关注，多次阅视，令地方大吏将柴塘改建为石塘，“为民间永远御灾捍患”。⑨同时，他南巡中也注意到咨访吏治，咨访民情，曾多次蠲免赋税，赦免人犯，增广学额等。这些举措，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发展生产、维系人心，加强统治的作用。这也正是学界某些论者为“乾隆六下江南辨”的依据。但是，一则乾隆的这些举措，常常只是巡行中的点缀，并非其主要精力所系；二则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与康熙时期有很大变化，那些举措也并非是当时应着力解决的社会问题，因此，乾隆南巡的积极效果，远非像康熙那样显著。

乾隆作为封建帝国鼎盛时代的“太平之君”，他长于安乐，习于骄奢，游山水成性，嗜园林成癖，又纵恣声色，铺张无度，晚年益甚。他南巡的主要目的，与康熙的“非为游观”不同，的确是如他自己所说“江南名胜甲天下”，欲借南巡之机，“眺览山川之佳秀，民物之丰美”。⑩因此，他每于南巡前一年，就进行周密准备，特指定亲王一人任总理行营事务大臣，负责勘察路线，修桥铺路，葺治名胜，兴建行宫。南巡中，除皇太后、皇后、嫔妃外，另有扈从官兵，上至王公大臣，下至章京侍卫，多达两千五百人，兴师动众，前呼后拥，浩浩荡荡。行进中，陆路用马五六千匹，大车四百余辆，征调夫役不计其数。水路则用船一千多只，首尾衔接，旌旗招展，声势显赫。沿途还兴建行宫三十多处，每处都“陈设古玩并应用什物器皿及花盆景致之类”。⑫因乾隆讲究排场玩乐，地方官自然争相逢迎，惟恐或后，献媚争宠。每到一地，“圣驾入境前一日”，地方官便专程出境迎接，准备好大量美食佳肴，“以便取用”，甚至派遣猎户，捕捉麻雀、野兔等禽兽，以供乾隆随身所带鹰犬食用。⑬尽管乾隆于每次巡行之前，都照例申饬一番，要求地方官吏，“务敦本业，力屏浮华”“时时思物力之维艰，事事惟奢靡之是戒”。⑭但不过是沽名钓誉的官样文章。实际上乾隆对地方官的逢迎，不仅默许，甚至奖励。如三十年，乾隆奉皇太后第三次南巡，“地方大吏以慈驾临驻旃庐，究不若屋宇之安善”，纷纷葺建行宫，乾隆则以“成事不说”为由，不仅不加劝止，反从公项内拨出巨款，凡有行宫之处，各“赏银二万两充用”。⑮素以豪奢著称的两淮盐商，每在乾隆南巡时，都献纳巨款，供其挥霍，乾隆不仅不予推辞，还称赞他们“踊跃急公，捐输报效”，给予加恩赏赐，除赏加盐引外，再“各按其本身职衔加顶带一级”。⑯靡费之风一开，各地群起效尤，对社会风气造成极坏影响。据统计，乾隆六次南巡，各项花费总数达二千多万两，至于所带随从与地方官吏乘机向百姓敲榨勒索，则难以计数。

乾隆六次南巡，极大地加重了群众负担，致使民间叫苦连天，怨情沸腾。为此，一些正直的官员曾进谏：“上两次南巡，民间疾苦，怨声载道”，“巡幸所至，有司一意奉承，其

流弊及于百姓”。然而，乾隆不仅不采纳进谏之言，反而对之厉声诘问：“汝言民间疾苦，试指何人疾苦，汝谓怨声载道，试指何人怨言？”⑰甚而冠冕堂皇的说：“朕清跸所经，观民问俗，关政治之大端，即动用数十万正帑亦何不可？”⑱似乎其挥霍浪费尚有理有功，实在是蛮横和霸道。乾隆的刚愎自用，我行我素，加之其连年用兵，耗费巨资，终于导致民财日以竭、民风日以奢，使潜伏的社会危机，终于全面爆发，清王朝也很快从盛世的顶峰上跌落下来，由治而乱，由盛而衰。对于南巡造成的恶果，乾隆晚年已有悔悟，他曾对一位大臣说：“六次南巡，劳民伤财，作无益而害有益”，并劝戒后世之主，再不要像他那样南巡⑲。然而，追悔之言，却为时过晚，其造成的恶果，已无法挽回。因此，我们说，乾隆的六次南巡，是导致康乾盛世由盛转衰的重要因素，决非过苛之词。也只有把康乾南巡和康乾盛世联系起来，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其历史作用和影响！

有的师友对乾隆南巡持较多肯定态度，他们认为历史上的封建帝王，究竟是长期在宫廷内深居简出，养尊处优好呢？还是经常下去到各地游走，咨访吏治民情了解社会下情好呢？乾隆六次南巡，对社会情况有较多的了解，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，岂不比锁锢在深宫更好吗！问题在于他走出去的目的、作用和实际影响，而不能离开具体史实，抽象地谈论问题，康熙和乾隆都曾六次南巡，然而其目的、作用和影响却迥然有别，所以我们才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，给予不同的历史评价。

---

①《龚自珍全集》第106页，
②《清圣祖实录》卷154。
③《清圣祖实录》卷117。
④《东华录》康熙朝卷66。
⑤《东华录》康熙朝卷34。
⑥《东华录》康熙朝卷43。
⑦《康熙帝传》赵晨译本第22页。
⑧《履园丛话·旧闻》。
⑨《御制南巡记》。
⑩《南巡盛典》卷50。
⑪《东华录》乾隆朝卷30。
⑫、⑬《南巡事宜》。
⑭《南巡盛典》卷1。
⑮《东华录》乾隆朝卷61。
⑯《南巡圣典》卷68。
⑰转引自肖一山《清代通史》第二册。
⑱、⑲《清史稿》《吴熊光传》。